

漫话救国会

沙 里



文史資料出版社

K264/3

漫 话 救 国 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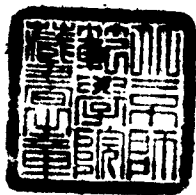
沙千里 著

张启宗 许九星整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35255



文史资料出版社

935255

责任编辑 俞兴茂

漫话救国会

沙千里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燕华营印刷厂印刷

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1/4 插页:2 字数:135,000
印数:1—13,500 定价:0.78元
统一书号:11224·126

序 《漫话救国会》

史 良

救国会是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建立的一个爱国救亡组织，全称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是当时中国经济的中心，也是中国近代无产阶级的摇篮。上海的广大市民由于直接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上海文化界、妇女界、学生界，在爱国救亡运动中走在战斗的最前列，是决不偶然的。当时席卷全国的爱国救亡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号召和积极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救国会则是这一运动的直接产物。宋庆龄、鲁迅、茅盾等光辉的名字，都曾和这一伟大运动联系在一起。如果从一九三五年算起，这个运动到现在已经三十八年了，若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则有四十二年之久。在约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极其伟大的变化。《漫话救国会》这本书，是沙千里同志在四十年后写的一本回忆录。可惜成书之日，也正是他辞世之时，此书是千里最后的著作。书中所提到的同时代的战友和同志，有的已经作古，有的还在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翻阅手稿，如见故人，这是一种欣幸，但也令人伤痛。它使我重新想起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牺牲的李公朴同志和积劳成疾不幸病逝的陶行知、邹韬奋诸同志，还使我重新想起当年其他许多同生死、共患难姊妹和兄弟，使我重新想起那天天闪

光的岁月，颗颗火热的心。

救国会从成立到结束，前后经历了十四年。千里在本书中把这十四年分为三个阶段，我看是比较恰当的。第一阶段是抗日救亡阶段。从它成立之日起到抗战爆发。这是救国会的历史上斗争最激烈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发生过因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救国会领导人的“七君子”事件，其后则有西安事变和由宋庆龄等发起的爱国入狱运动，在当时有很大影响。继而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第二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时期救国会实际上变成了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团体，其后参加民主同盟，便和民盟的活动全部结合起来。在旧政协中，沈钧儒老人曾以民盟身份参加会议，章乃器和我则曾以顾问身份参加民盟代表团的工作。抗战胜利以后，进入第三阶段，一九四五年底，我们在重庆集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制订了以建设新中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其后参加了为推翻蒋介石王朝而进行的各种斗争，直到响应中共召开政协的号召，参加新政协。建国以后，中国人民救国会认为自己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而宣布结束。

中国人民救国会结束于一九四九年，当时曾举行过集会。沈老在会上说：现在，“有了人民政协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作为施政方针，有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中国的这一条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是可以坦步无忧的。”那次议会还作过一个决议，由沈钧儒、史良、沙千里、沈志远、千家驹、胡愈之、萨空了、曹孟君、王健九人组成纪念委员会办理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杜重远及其他为救国运动而牺牲的救国会烈士的永久性纪念事业。这个委员会中虽又有四位物故，但纪念委员会的工作仍在进行。千里这本书当也可以视作纪念活动的

一部分吧！

救国会的全部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的重要转变时刻的一切政治主张和政治行动，都是符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解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与成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人民的民主和国家的富强。回顾这段历史，感想万千。我要把这个基本认识和信念记述在这里。

当我提笔撰写此文时，正是一九八三年的新春佳节，举国上下，在大兴改革之风。这次改革之风本是从农村兴起的。我国农村曾经经历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两大运动，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但却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吃大锅饭”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判了“左”的错误，实行了以联产计酬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农业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与这一变革可以相提并论的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其结果是另一种伟大的生产力——知识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实践证明，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目前在各条战线上兴起的全面、系统的改革，正是三中全会路线获得坚决贯彻的结果。这是一股强劲的风，它将把大地吹绿，把山花吹红，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东西，都将在摧枯拉朽的大风浪前被涤荡干净。我们民主党派在改革运动中也负有重要的责任，希望大家都重视这次改革，我自己也要为之竭尽绵力，必期其成。这是我的新的誓愿，谨以此意作为本书的序言。

一九八三年二月

前 记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紧入侵，妄图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的殖民地，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一再屈膝投降，对内加紧围剿红军和镇压工农运动，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人民群众忍无可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救国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

一九三五年底到一九三六年春，上海各方面的救国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先后成立，全国各地的救国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卅一日在上海宣布成立。救国会经历了抗日救亡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新中国成立后，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北京宣告结束。十四年间，救国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爱国民主力量和爱国民主人士，同帝国主义、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艰苦的斗争，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正如《中国人民救国会向毛主席致敬函》中所说：救国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抗日战争中，在人民解放战争中，都作了一些工作，并且贯彻了我们的工作目标”。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我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六年二月，我与其他一些同志

一起发起建立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从此，我作为救国会的一员参加了救国会的主要活动，在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中国人民救国会的领导机构中担负工作，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救国会结束。

近几年来，许多同志都督促我写关于救国会的回忆录。我虽然年已八旬，且病魔缠身，但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也是我的义务和责任，我应当把我经历和知道的东西留下来。这两年，我陆续看了一些资料，作了一些回忆，形成这个回忆录。我力求比较完整地记述救国会的历史，反映救国会活动的全貌，特别是一些重大的事件。但是，由于时间已过去很久了，年龄大记性也不好了，许多事情都记不清楚甚至忘却了，很多材料未能收集到，身体多病也不能多拜访救国会的老同志，因此本文一定有不周全和不准确之处，殷切希望救国会的同志和对救国会研究有素的同志予以补充和订正。

这个材料写作过程中，不少同志都很关心并给予帮助。张启宗同志主动提出帮助我整理，记述和整理了第一稿。许九星同志在此基础上，参阅了一些材料，帮我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使之脱稿。周天度、王健等同志供给了有关资料。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沙千里

一九八一年五月

目 录

一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	(1)
	(一) 救国会成立前的抗日救亡运动	(1)
	(二)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地抗日 救国组织的建立	(5)
	(三)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	(13)
	(四)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负责人被捕 前救国会的抗日救亡活动	(18)
二	七人之狱和围绕这一事件展开的斗争	(30)
	(一) 我们七人第一次被捕获释	(30)
	(二) 我们六人第二次被捕入狱	(33)
	(三) 自租界捕房移送上海市公安局	(38)
	(四) 从上海市公安局移解苏州江苏高等 法院	(42)
	(五) “西安事变”与救国会	(46)
	(六) 五次侦讯	(50)
	(七) 提起公诉	(54)
	(八) 第一次开庭审判和围绕审判展开的 斗争	(62)
	(九) 第二次开庭审理和法庭内外的斗争	(69)
	(十) 胜利出狱	(77)

三 抗日战争中的救国会	(80)
(一) 在上海的活动	(80)
(二) 在武汉的活动	(84)
(三) 在重庆的活动	(89)
四 解放战争中的救国会	(100)
(一) 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成立	(100)
(二) 为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而斗争	(102)
(三) 救国会结束	(108)
结束语	(109)

附件: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 一九三六年六	
月一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	(113)
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全	
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 ……………	(124)
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 一九三六年	
七月十五日 沈钧儒 章乃器 陶行知 邹韬奋…	(133)
全救会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 一九三	
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146)
沈钧儒等答辩状(摘录) 一九三七年六月七日……	(149)
中国人民救国会政治纲领 一九四五年冬 ……………	(173)
沙千里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发言 ……………	(180)
中国人民救国会结束宣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十八日 ……………	(183)

一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

（一）救国会成立前的抗日救亡运动

救国会成立前，全国千百万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就已经开始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甲午战争和“二十一条”就是例证。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迫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放慢了吞并中国的步骤，然而其野心并没有死。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帝国主义各国为了摆脱这一严重的经济危机，一方面在国内加强对人民的剥削和镇压，实行法西斯统治；另一方面对外加紧侵略，挑起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兵侵略我国东北，开始了独霸中国的战争。蒋介石醉心于“剿共”内战，命令张学良“绝对不抵抗”，退出东北，致使我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丧。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下降，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状况和阶级关系，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发展。九月二十四日，上海三万五千多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二十六日，上海各界十万余人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全国各地的工人、

学生和各界人士也先后纷纷罢工、罢课、罢市、组织示威游行和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要求一致抗日。城镇工商业者和全国人民开展了抵制日货和对日经济绝交的运动，出现了抵制和检查日货的高潮。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济南等城市的大批学生代表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请愿示威，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和不抵抗，捣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使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国民党及其军队中有爱国之心的人士，不断地自动起来要求抗日。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一月间，日本军队进攻黑龙江省，当地驻军马占山部奋起抵抗。十二月，奉命在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多人，不满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投降政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在赵博生、董振堂领导下，在宁都举行起义，参加红军。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侵犯上海，企图短时间灭亡中国。驻上海的十九路军爱国将士，违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英勇抗击日军。上海各界群众一齐动员起来支援前线。上海的日本工厂的工人大罢工，工人和学生组织义勇军，到前线参加作战，许多人英勇牺牲。更多的人担任运输、交通、救护等工作。无数的人捐出自己的存款、日用品支援前方。全国各地人民也都积极支援上海抗战。当时，我作为一个目击者和参加者，深深为十九路军爱国将士、以及上海和全国人民的爱国抗日热忱所感动。在军队和群众结合下，上海军民排除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干扰，坚持抗战一个多月，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地打击，使其几换主帅，死伤万余，粉碎了其几小时占领上海的计划。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寇在占领热河省会承德之后，

向长城各口发动攻击，企图一鼓而下华北。驻守在长城线上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将士和长城内外的义勇军，自动奋起抗战。五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布对日作战，给日军以严重打击。

在民族危亡之机，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爱国人士也参加到抗日救国运动中来。他们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国策，恢复中苏邦交，停止“剿共”，一致对外。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呼吁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的抗日自由权利。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和全国各地许多爱国人士创办了大量的宣扬抗日救国刊物，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邹韬奋、胡愈之、杜重远等主办的《生活》周刊、《新生》周刊、《大众生活》以及沈兹九、杜君慧主办的《妇女生活》，李公朴、柳湜主办的《读书生活》等报刊，影响全国，是抗日救国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一九三五年冬，我和徐步创办了《生活知识》，依靠当时许多作家的支持和帮助，在抗日救国运动中也尽了一些摇旗呐喊的责任。

一九三五年五月《新生周刊》刊登易水（艾寒松）所作《闲话皇帝》一文。日本帝国主义者穷凶极恶，以此借题发挥，胡说此文是有意侮辱他们的“天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结果，蒋介石反动政府屈膝降服，将该刊查封，命令法院逮捕了主编杜重远，判处了十四个月徒刑。杜重远在法庭上慷慨陈词，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强加给他的“违反敦睦邦交”的罪名，大呼：“中国人民不做亡国奴！”这一事件不仅震动了上海，而且震动了全国，更加深了人民群众的抗日反蒋激愤。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指出：“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各党派间、各界同胞间、各军队间，无论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或意见和利益上的差异，或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我们在上海读到了《八一宣言》的全文，大家相互秘密传递阅读并奔走相告，心情十分激动，一致认为宣言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反映了我们的愿望和要求。从此，我们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八一宣言》受到全国各界的热烈拥护和支持，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北平学生的爱国精神受到全国人民的敬佩。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得到各地的响应，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当时，北平的学生运动成为我们谈话和注目的中心。抗日救亡的报刊更是大声疾呼，支持这一救亡活动。

《大众生活》的封面上就刊登了北平学生在天安门前手持话筒宣传抗日的大幅照片。上海大、中学校学生八千多人，连夜游行请愿，对北平学生表示支持。一二九运动对上海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很大推动，促成了上海和全国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

十二月十二日，上海文化界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对北平学生运动表示坚决的支持，指出“华北教育界‘最后一课’的决心，是值得赞佩的。华北青年热烈的救国运动，

尤其引起我们十二万分的同情。”《宣言》提出坚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坚决否认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要求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东北伪组织；要求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等主张。

在《宣言》上签名的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沈兹九、钱俊瑞、金仲华、潘大逵、周新民等二百八十多人。

这一《宣言》，表达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和主张，受到普遍的欢迎。各界代表都纷纷发表谈话和文章，支持文化界这一《宣言》。这一《宣言》推动了上海市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直接促成了上海各方面救国会的成立，并对上海的救亡运动和救国会的工作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从此以后，在广泛深入开展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形成了有纲领、有组织的救国团体。抗日救亡运动以新的面貌在上海及全国出现了。

（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地 抗日救国组织的建立

我自己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深侵略，民族危机日益紧迫的形势下，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自发地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的。在参加救国活动的过程中，同地下党的同志有了联系和接触，读到党的刊物和文件，逐渐地接受了党的思想和主张，提高了斗争的自觉性，并在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开始阶段，是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斗争也是分散的。虽然在一定的时候为了进行斗争，也有一些串联，但没有固定的形式把大家联系起来。为了某一件事而进行的斗争结束之后，这种联系也就终止了。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为了更有力的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大家感到需要一个固定的形式把群众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领导之下，在千百万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上海各方面的救国会先后建立，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各界群众也建立了各种救国组织。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妇女界代表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这是上海建立较早的救国组织。妇女界救国会的领导机构叫理事会。大会推选上海妇女界的著名人士史良、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陈波儿等十一人为理事。他们曾办过《申报》的妇女副刊、《中国妇女》、《妇女生活》等刊物；有的人还深入到工厂，帮助上海纱厂女工办了《小姊妹》等刊物，秘密宣传抗日。这些活动为推动妇女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起了很好的作用，为妇女界救国会的成立准备了一个较好的群众基础。

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成立大会之后，近千名妇女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四川路出发，浩浩荡荡，穿过南京路，至日升楼向南转到东新桥，到达老西门结束。国民党反动派毫无准备，所以示威队伍没有遇到国民党宪警的阻挠和租界巡捕的干扰。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举行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三百多人，其中有许多知名的作家、新闻记

者、导演和演员、教授、律师、宗教界人士等，是文化界爱国知名人士的一次盛会。大会推选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沈兹九、顾名、江问渔、胡愈之、谢天逸、夏丏尊、金仲华、欧阳予倩等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大会发表了《上海文化界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宣言》指出：“因为我们过去的工作是万分不够，所以我们现在要先组织自己，用集团的力量，来负担我们时代的任务。”这个《宣言》在第一次《宣言》的基础上，更加具体地提出自己的救国主张。《宣言》提出：根本改变目前外交政策；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阵线；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八项主张。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马上执行：严惩各地摧残救国运动的负责长官；取消对爱国运动的戒严令；撤废新闻检查制度，开放新闻封锁；释放被捕爱国学生及市民等四点。《宣言》还向全国文化工作者提出了五项要求。这些主张和要求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而提出的，是对其卖国政策的尖锐揭露，受到上海和全国各地爱国群众的一致赞同，也为国民党反动派所仇视。

一九三六年一月九日，顾名、沈钧儒、王造时、潘大逵、张定夫、潘震亚、曹聚仁、孙怀仁、吴清友、周新民、汪馥炎等发起成立了大学教授救国会。

与此同时，袁牧之、陈波儿等组织了电影界救国会；陶行知、戴伯韬、刘季平等组织了教育界救国组织——国难教育社；此外，还建立了学生界救国会、工人救国会、新闻界救国会等。

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简称“职救”，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九日成立。成立大会是在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会址召开的。“职救”